

沪上举行《彼得堡》《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新书分享会——

重新认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小说创作

本报记者 傅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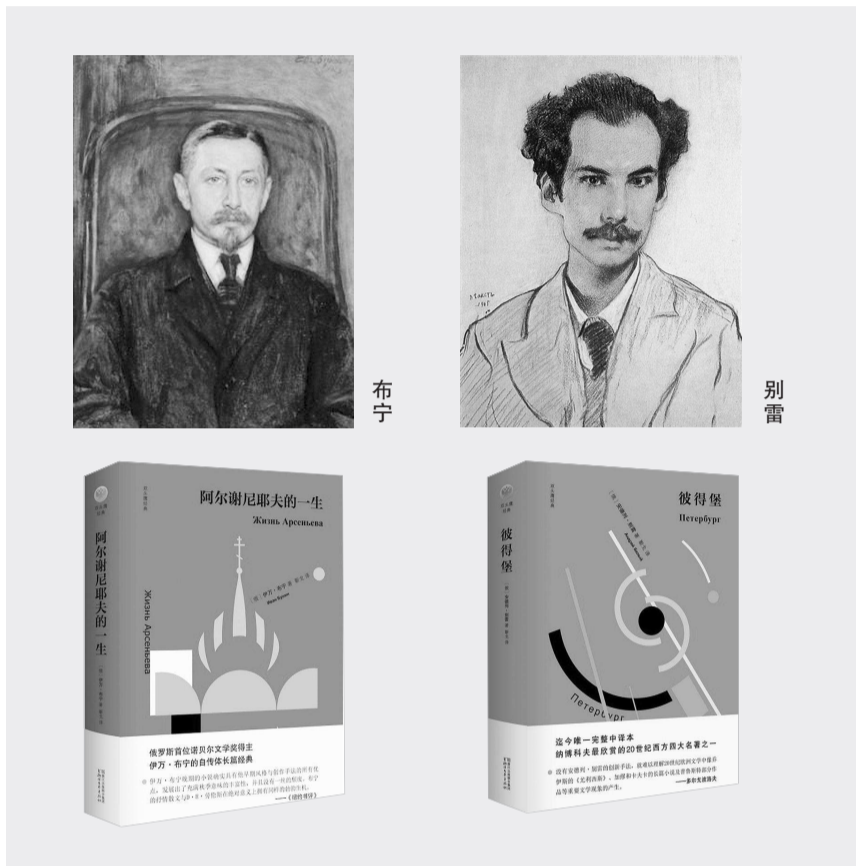
俄国“白银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安德列·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成书于1916年,1922年出版俄语删节本。《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则出版于1933年,是俄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凡·布宁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按出版时间序列看,后者理应比前者更为“进步”和前卫。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说《彼得堡》写了“流动”的城市,《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则写的是“静止”的乡村。

这并不难理解。毕竟文学从不遵循按时间序列线性“进化”的原则。而作家不同的经历也决定了他们会有不同的创作。譬如,别雷虽然在《彼得堡》里写了彼得堡,实际上他1880年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大学数学系教授,父亲爱好音乐,擅长演奏钢琴。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03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又留在该校文史系继续学习三年。1906年至1923年间,别雷曾多次出国,先后去过法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非洲和中东地区,旅居次数最多,时间较长的是在德国柏林,二十年代中期后基本定居莫斯科,直到1934年1月病逝。他从小生活过的,位于莫斯科阿尔巴特街55号的一座三层建筑,如今已被辟为别雷博物馆,博物馆里维持着作家生活时的情景,让人可以充分感受别雷的日常生活。可以想见,从小在城市里生活的别雷,对城市自然有深刻的观察和感悟。

相比之下,布宁1870年生于俄国波罗纳捷市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祖上曾是显赫的贵族。布宁三岁那年,全家搬到他们置产的乡村沃罗涅什镇去生活。布宁长大后,由于经济拮据,只读了四年书便辍学在家,靠大哥的指导进行自修。刚满18岁,布宁便只身走向社会独立谋生,曾当过校对员、统计员、图书管理员,甚至摆过书摊卖过报。1887年4月,因在彼得堡《祖国》周刊上发表了一首诗歌作品,才得以于同年在奥廖尔市一家杂志谋得薪酬微薄的戏剧评论员职务。1895年,布宁曾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结识作家契诃夫和俄国象征主义文学名家勃留索夫,从此专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如此看来,别雷写城市,布宁写乡村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思想意识的不同,又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两人有不同的创作视野。别雷始终以超党派自居,年轻时,他深感沙皇俄国黑暗,于是总是赞成变革,不管是什么样的变革,他都拥护。到了苏维埃时代,虽然不理解甚至公开表示不赞同当局的某些理念,却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祖国的新文化建设,应邀热情为青年作者授课或进行专业指导。

不同于别雷,布宁就显得保守多了,他似乎从没忘记永远已经逝去的“黄金般美好的”贵族生活,成了作家后,也始终自命清高,孤芳自赏。到了1905年底第一次民主革命在全俄罗斯城乡蓬勃兴起时,布宁辞去当时在《真理》杂志社的任职,出国旅游。再后来,到了1920年1月26日,红军攻克南方重镇敖德萨,他携妻子搭乘一艘法国邮轮离开俄国。后几经周折,于同年3月辗转抵达巴黎,两年后迁居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滨海省一个叫格拉斯的小镇。他的后半辈子,除每年到巴黎过冬及短时间的出访、旅游,基本上都在那里度过。当然,布宁虽然长年生活在异乡,却在写作上频频回望故国山河。由此,两位同时代作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甚至有着某种对照性的创作面貌,就很好理解了。



但这并不是说,布宁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别雷则是对这一传统的离经叛道。这两位作家,如批评家张闳在日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彼得堡》《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新书分享会”上所说,生活在马车时代和火车时代的转换时期,布宁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里写没落贵族的生活,还残留着托尔斯泰笔下俄罗斯乡村生活的影子,有着比较慢的节奏,他的叙事仿佛也停留在马车时代。也因此,小说总是给人感觉像马车一般慢慢前行,甚至有停滞的感觉,这部分原因在于如翻译家曹元勇所说,布宁以很大篇幅描绘自然,他把自然当成了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反观中国,从四大古典名著开始,大多数文学作品里都少见对自然的描写,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而对于布宁来说,俄罗斯幅员辽阔,到处是森林草原,浓墨重彩写大自然是自然而然的。”如其所言,在感叹古老的俄罗斯正在逝去的同时,这部小说的确让人感觉到那种真实的俄罗斯大地和乡土的浓郁气息。张闳表示,布宁显然对古老的俄罗斯有一种缅怀,体现在他后来写的其它小说《安德诺夫卡苹果》等也是这样,那种情怀可谓非常浓郁。

而《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革新之处,或许在于作品的体裁。小说以主人公阿列克谢·阿尔谢尼耶夫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基本线索,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着重表达“我”对大自然、故乡、亲人、爱情和周围世界的感受。作品发表之初,就有人认定这是作家个人的“自传”,但布宁本人断然否定了这一说法,强调它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后来,确认这是一部小说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但称它为“艺术性自传”或回忆录的,仍然大有人在。一些作家评传和文学史著作将这部作品视为长篇小说,崇拜布宁的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却把它称作中篇小说,但又认为

它和一般的中篇小说有所不同。帕乌斯托夫斯基写道:“我依旧把《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称为中篇小说,尽管我同样有权把它称为史诗或者是传记。……在这一部叹为奇观的书中,诗歌与散文融为一体,它们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布宁创立了一种新颖的、绝妙的体裁。”当代的一位俄罗斯评论家则说:这部作品“有点儿像哲理性的长诗,又有点儿像交响乐式的图画”。而布宁自己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称这部作品为“笔记”。

《彼得堡》在体裁上的创新就不言而喻了,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别雷开创性地使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才使得纳博科夫把《彼得堡》与《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和《变形记》一起,评为“20世纪前期西方四大小说名著”。而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出版的一部专著的说法:“没有安德烈·别雷的《彼得堡》,就难以理解二十世纪欧洲文学中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加缪和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及普鲁斯特部分作品等重要文学现象的产生。”以张闳的阅读观感,《彼得堡》是一部碎片化的、爆炸式的、快捷的作品,虽然被普遍认为是意识流小说,实际上并不是很纯粹的意识流,别雷还用了一种蒙太奇手法,小说里快速闪现各种各样的景观,句子破碎,节奏很快,像坐高速列车闪过一样,呈现了一个流动的城市景观。“《彼得堡》的节奏甚至比《尤利西斯》还要快,而且是快到了所有的连续的东西都打破了、破碎了,而那些片断又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作家叶开则特别注意到《彼得堡》日俄战争的写作背景,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战争,最终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我们的历史一般只简单写到列强在我国土地上开战,殊不知那是一个极其敏感而特殊的时期,它震动了亚洲和欧洲

两块大陆,由此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事件。”这一时期的彼得堡可谓思潮汹涌,在别雷笔下,彼得堡是一座患了高烧的城市,潮湿则构成了彼得堡城市的外部景象,与阴晦潮湿的氛围形成映照的是干燥的内在景观,人物的意志之火,如忽明忽暗的火苗。也因此,别雷在小说里摒弃了对历史细节的准确还原,而是用意识流的手法,呈现历史情境下典型人物的内心思绪和“灵魂的疾病”。

正因为这种创新,如该书译者靳戈所言,《彼得堡》在描绘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以及暴露批判黑暗现实的精细、深刻方面也许不及经典的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借助于艺术象征和意识流及通过二者的结合所表现的俄国和世界当时正面临的灾难性危机方面,却要比用它同时代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写成的作品强烈、紧张得多,因此也更震撼人心,催人猛醒。

但《彼得堡》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靳戈表示,小说里不少主要事件和人物,都直接来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名著。例如,阿波罗·阿伯列乌霍夫及其与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和儿子尼古拉的关系,立刻让人想起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卡列宁一家人,等等。“《彼得堡》的独到之处在于,别雷根据现实和艺术本身的发展,利用前人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加以讽刺模拟性的再创造,在表现‘沙皇统治下彼得堡的覆灭’这个传统的和流行的主题时具有了新的内涵。”另一方面,得益于对文学经典的讽刺模拟,《彼得堡》通篇笼罩着一种亦庄亦谐的气氛。不仅如此,在靳戈看来,别雷还力求各种艺术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长篇小说形式的艺术表现力。“整个作品犹如一幅包罗万象的巨型绘画或雕塑,别雷的手法时而简朴明快,时而沉重凝重。许多完全或基本相同的句子、段落,在不同情况下的多次重复等等,体现了别雷对诸如对位、变奏、转调等音乐中作曲法的技巧的借鉴和移植,使得小说读来像一部复杂的交响乐。”

事实上,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看,无论是《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还是《彼得堡》,都体现出了不合时宜的特点。如果说前者给古典俄国乡村唱了一曲挽歌,后者则是唱给俄国城市的堪称空前绝后的序曲。以叶开的理解,别雷以及同时代的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等,还能通过文学的方式,在盛行整齐划一的美学的时代,在写作中呈现出一种混乱的,不同步的,乃至碎片化的美,这本身就体现了他们的卓越之处,也是对我们当下写作很有启发的地方。

当然,两位作家与时代的“不同步”,也让他们的创作有了不同的遭际。《彼得堡》问世后虽然走红过一段时间,但从别雷逝世不久的三十年代中期开始,这部作品也渐渐被冷落了,自1935年以后再也没有重版过。苏联文学界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对别雷以及他的作品重新发生兴趣。而布宁的创作也差不多到五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受到重视。

显而易见,像别雷和布宁这样的作家,和他们的时代之间有一种不协调性。在张闳看来:“如果说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片固化的废墟,他们的使命就要收拾这片废墟,通过他们的语言的乌托邦,为特定的时代提供某种远景,并担负起扭转乾坤的使命,这恰恰体现出他们创作中一种整体性的价值。”